



研究生往事：在地板床上，听夜猫伴奏，看分子跳舞（下）

本文转载自江明院士创办的《旦苑晨钟》公众号，原文为彭慧胜院士撰写的研究生回忆文章。彭慧胜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生求学往事，分享了在科研起步阶段的探索与成长，其中蕴藏的科学精神，对青年学子和科研工作者具有指引价值。

文献搜寻的“长征”

我读研时期的文献信息获取渠道非常有限，很是艰难。2000年初的科研信息环境，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，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匮乏。图书馆是我们获取文献的主阵地，但馆藏的外文期刊种类有限，且到刊严重滞后，延迟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是常态。为了找一篇关键的参考文献，常常需要在书架间反复“淘金”，有时还需要填写文献传递申请单，等待馆员通过馆际互借等方式获取复印件，然后再交给我们，过程漫长。复旦日月光华BBS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，是重要的信息集散地。化学、高分子相关的版面，经常会有师兄师姐分享经验，发布学术信息，甚至帮忙查找或传递文献。这种情况到我读研后期有了一些改善，可以通过国外的师兄师姐们获取一些文献；参加学术会议、听报告时，留意报告人提到的文献；主动向有经验的老师、师兄师姐请教他们关注的文献来源。各种“非正式”渠道都被充分利用起来。这种信息获取的艰辛，一方面让我们倍加珍惜到手的每一篇文献，反复研读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主动搜寻信息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能力。对比今天一键获取海量信息的便捷，更能体会到当时科研工作者克服信息壁垒的不易。这段经历也让我后来格外重视信息的开放获取和高效传播。

感恩科研支撑人员

我读研时期的科研工作得到了支撑平台老师的大力支持，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感激之情，许多温暖的片段至今难忘。仓库的“刷脸”与信任：我经常去学校仓库领实验耗材，有事没事都与管理员聊几句，一来二去就相互熟悉了。那时领耗材还需要带着经费本，现场签字划账。有时经费本忘拿了，仓库的管理员老师因为对我熟悉，知道我做事靠谱、守信用，允许我先“赊账”拿走急需的物品，后续我再及时补办手续。这种信任，在科研起步阶段解了我的很多燃眉之急。多年后，我回复旦工作，仓库的老师还能认出我，这让我颇为感



■ 我与陈道勇老师(2003年)

动。光散射老师的“插空”情谊：系里公共实验平台的动态/静态光散射仪预约常常排满，负责的老师非常忙碌。在我虔诚地表达了自己样品的特殊性和时间紧迫性后，老师经常会在常规测试间隙，“插空”帮我测几个样品。电镜老师的“午休时间”：需要用到扫描电子显微镜时，得去化学系平台。负责老师中午通常是午休的。我恳切地对她说说明实验的紧急性和样品的珍贵，有时效性，可能我的坦诚和对科研的热情打动了她。她多次牺牲午休时间，专门为我做实验。这份无私的支持，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莫大的帮助。医学院电镜老师的“热情援手”：当年做透射电子显微镜要去枫林校区的医学院电镜平台。我常坐班车提前赶过去，若老师还在忙碌，就主动帮忙打下手。一来二去，电镜室的老师们都认识了我，可能觉得这小伙子挺主动、实在，都愿意在关键时刻友情为我挤出些时间，并悉心指导，帮我解决了一些疑难困惑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科研之路绝非独行，他人的援手无比珍贵。而赢得帮助的核心，在于主动真诚、诚实守信和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。每当实验取得进展时，我都会及时与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，偶尔也会挤出一点儿生活费，给他们买个小礼物，真的是很便宜的那种。他们也会因此感受到工作的快乐和我的真心，觉得我是值得被帮助的。

主动迎来的当头棒喝

通过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，我发表了4篇重要学术论文（*Macromolecules* 2005, 38,

3550; *Macromolecules* 2003, 36, 2576; *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* 2003, 107, 12461; *Langmuir* 2003, 19, 10989），建立了强烈的自信心，确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生目标。毕业时想着一定要去高水平研究的地方进一步开阔眼界，提高科学品味。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，也推动我想走出国门去感受不同的文化。那个年代，中国跟美国在科研硬件和软件方面差距甚远，因此我考虑去美国读博士。

2002年，我跟随江老师去北京参加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，这是高分子界最权威的学术会议，大咖云集，三位因导电高分子研究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（Alan J. Heeger, Alan G. MacDiarmid, 白川英树）都来了。尽管那时我英语口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，水平也有限，但我抱着“无知者无畏”的态度，在他们报告结束后主动上前做自我介绍，对他们所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。我连比带画地跟他们讲，我估计他们也是连蒙带猜地解答我的疑问。可能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中国学者，特别是像我这么年轻的学生向他们提问，我的大胆和热情似乎给他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，能看出他们对我的感觉还不错，我就说想去美国读博士，您能不能给我写个推荐信。他们欣然应允，给我写了几句话，并留下了珍贵的签名。

我如获至宝，将这些推荐信郑重地放入博士申请材料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却在申请顶尖学校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。我当时联系了很多美国教授，他们都给了我正面的回应，

引起男同学们的“竞相追逐”。身材魁梧的李天龙师兄很喜欢也很能吃肉，他对此有个“执着”和略带羞涩的解释——“我就喜欢那个味儿”，成了组里的经典梗。席间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既解了馋，也极大地缓解了科研的压力。这种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文化的重要性。它不仅是科研攻关路上的集体力量，更是大家精神上的依靠。这对我日后的课题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我努力营造信任、宽松、互助的课题组文化，尊重学生的个性与选择，不强制作息，信任他们，强调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大家的成长、成才。让学生们明白所做工作的意义不只是单纯为老师“打工”，更在于工作中提升自身能力。当然，对于学术不端等触及底线的行为，我的批评会非常严厉，但对事不对人，适当给学生改正的机会。在复旦读研的三年，是我人生中物质清贫却精神富足的三年。我靠着助学贷款和周末家教维持学业，生活简朴。然而，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，在团队中感受温暖，在书海与讲座中汲取智慧的每一天，都充满了沉甸甸的收获感。这段岁月，奠定了我学术生涯的基石，锤炼了我的心性品格，更让我找到了毕生热爱的事业。这份淬炼，让我无论日后在异国攻读博士学位，还是重返复旦执教、服务，都始终带着在复旦求学期间形成的那份韧劲、直觉，对团队的珍视，对严谨的敬畏和对科学纯粹的热爱，努力前行。回望历史，我觉得智商、情商和择商三个因素很是重要。智商和情商已有诸多讨论，择商就是作出最佳选择的能力。选择对了，往往事半功倍，越做越带劲；方向错了，越努力，可能离成功越远。从复旦出发又回到复旦，在长期的研究历程中，我努力理解科学发展规律，寻找原创研究方向，培养科学直觉，享受科研乐趣。但当年确实是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复旦，选择江老师和陈老师，现在想来真是运气好。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做了半辈子研究，能乐在其中，要感谢复旦，感激高分子系，感恩敬爱的老师们，还有聪慧勤奋的学生们，岁月静好又无限温暖！

彭慧胜（高分子科学系和纤维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院教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）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udan_media@fudan.edu.cn